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6.015

《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张永江, 彭佳成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读史方舆纪要》系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名著,对后世裨益颇深,但由于篇幅宏大、流传曲折,传世本中仍有错漏之处。整理本《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记载便存在数量、名称前后矛盾以及错漏情况。究其原因,或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其二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发现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的记载与《读史方舆纪要》所总结的基本相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

关键词:《读史方舆纪要》;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

中图分类号: K90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6-0114-09

引用格式: 张永江, 彭佳成.《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6): 114-122.

Correction of the Records About Datong Roads and Forts in *Du Shi Fang Yu Ji Yao*

ZHANG Yongjiang, PENG Jiacheng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Du Shi Fang Yu Ji Yao* i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masterpiece written by Gu Zuyu, which is of great benefit to future gener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mistakes in this book because of its enormous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spread gap.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records about fort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Datong East Road, Datong Middle Road and Datong West Road are inconsistent in quantity and name in *Du Shi Fang Yu Ji Yao*. There are two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errors. First, it might caused by Gu Zuyu's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books. Second, there are omi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can be found that Gu Zuyu was influenced by the vicissitud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lack of record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ts controlled by Datong East Road, Datong Middle

收稿日期: 2021-08-27

作者简介: 张永江(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及蒙古史、清史、清代边疆民族史;彭佳成(1997—),女,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边疆民族史。

Road and Datong West Roa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Gu Zuyu's records only involved Ming dynasty. Because the records about the number of forts controlled by Datong East Road, Datong Middle Road and Datong West Road in local Chronicles are basically same with the summaries in *Du Shi Fang Yu Ji Yao*. Therefore, the errors in *Du Shi Fang Yu Ji Yao* can be corrected through the local Chronicles.

Keywords: *Du Shi Fang Yu Ji Yao*; Datong East Road; Datong Middle Road; Datong West Road

《读史方輿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是明末清初时人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著作。该书虽以刻本形式辗转流传,但在作者生前并未定稿。近年来,贺次君、施和金等人对《纪要》进行了整理与校订,可以说,他们整理的2005年中华书局版《纪要》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和通行的版本。不过,由于《纪要》篇幅宏大、流传曲折,整理本中仍存在错漏之处。《纪要》出版后,有不少学者曾对其中的问题进行辨析。笔者在阅读《纪要·山西六》时,也发现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名称、数量记载自相矛盾。

其一,大同东路中,《纪要》记录迎恩、败胡、瓦窑口、永嘉等四堡,在总结处却言:“已上共七堡,与阳和、天成、高山、镇虏四卫俱属大同东路管辖。”^{[1]2026}其二,大同中路中,《纪要》记录守口、靖虏、镇门、镇口、镇宁、云阳、牛心、红土、黄土等九堡,在总结处却言:“已上十一堡,与左、右、云、玉四卫俱属大同中路管辖云。”^{[1]2023-2024}其三,大同西路中,《纪要》记录马营河、破胡、残胡、杀胡、马堡、铁山、三屯、阻胡等八堡,在总结处却言:“以上三堡,俱大同西路管辖。”^{[1]2027-2028}

实际上,明末清初亦有另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即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大同地区形势、险要、卫所、城堡等进行了记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书于康熙初年,与《纪要》成书时间较近,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城堡的记载为:

东路参将驻天城城,所辖阳和、天成、靖虏、瓦窑、守口、永嘉、镇口、镇门、镇宁九城堡。

中路参将驻右卫城,所辖左卫、右卫、杀胡、破胡、铁山、牛心、残胡、马堡、云阳、红土、黄土、三屯、马营河一十三城堡。

西路参将驻平虏城,所辖平虏、迎恩、败胡、

阻胡四城堡^{[2]1947}。

其中,东路参将所辖阳和、天成,中路参将所辖左卫、右卫以及西路参将所辖平虏为城。若剔除城,可以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数目与《纪要》恰好相同,但两者对各路所辖堡名的记载相异。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著作性质也相近,那么,哪一家的记载更为准确呢?

对此,逻辑上不外乎两种可能:其一,顾炎武或顾祖禹对明代大同路、堡建置记载有误;其二,《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顾祖禹在撰写之时,或受到了清初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变化的影响。以下试比对资料,逐一验证。

一 明代史籍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边堡之记载

由于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各堡均为明朝设立,因此若要考察《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正误,需参阅明代记录。《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作为明代方志,对大同地区的军事形势、建置沿革等方面有所论述,两书对大同各路所辖堡的记载大致相同。

大同东路:本路参将分属阳、高、天成、镇虏四卫及靖虏、守口、镇宁、镇口、镇门、瓦窑、永嘉等七堡,辖六守备、三操守。分边沿长九十六里四分,边墩一百七十八座,火路墩九十座^{[3]116, [4]334-336}。

大同中路:本路参将原设左卫,嘉靖三十三年始移右卫驻扎……各城堡右卫马营河堡、破胡、马堡、残胡、杀胡堡、铁山堡俱极冲,左卫三屯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稍次之^{[3]132, [4]343-345}。

大同西路:本路参将分辖平虏、败胡、迎恩、阻胡,凡四城堡,俱极冲之地。边墙东起灭胡堡界,西止南沙河,沿长四十七里六分有奇,边墩六十八座,火路墩四十八座,小市场一处。幅员

非广,而以一参将、两守备、两操守当之,盖地冲故也^{[3]129, [4]347-348}。

可见,《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边堡数目的记载,与《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相同,均为大同东路辖七堡,大同中路辖十一堡,大同西路辖三堡,但对各路所辖堡名的记录不同。从成书时间来看,《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均成书于万历年间。考虑到明末战争频发、军事设置变化较多的情况,若仅与《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比,恐难全面考察明代大同路、堡的建置沿革。据此,笔者参阅了年代较近的《(康熙)山西通志》。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的记载为:

东路参将所管阳和、天城、靖鲁、瓦窑口、守口、永嘉、镇口、镇门、镇宁九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五千四百七十二名。

中路参将所管左卫、右卫、杀虎、破虎、铁山、牛心、残虎、马堡、云阳、红土、黄土、三屯、马营河一十三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九千九百二名。

西路参将所管平鲁、迎恩、败虎、阻虎四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四千五百八名^{[5]329}。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与《(康熙)山西通志》的记载相同。由此,可以推论明末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的建置未发生变化。

从时代背景看,大同镇属明九边之一。顾祖禹在《纪要》中亦强调了大同的战略地位:“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故明都燕,以郡为肩背之地,镇守攸重。

正统末恃以挫狡寇之锋,天顺石亨镇此,尝言:‘大同士马甲天下,若专制大同,北塞紫荆,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盖府据天下之脊,自昔用武地也。”^{[1]1993}可见,大同作为京师的屏障,在明代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修筑了大同一带边堡。

万历末年,明廷虽仍面临着漠南蒙古的挑战,但此时蒙古处于分裂状态。林丹汗东迁,难以构成较大威胁。与之相应的,辽东地区满洲势力逐渐崛起。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基本完成了女真部落的统一。2年后,以“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向明军发动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在辽东战场上占据了主导权。可以说,此时明朝军事防御的重点已转向辽东一线。

通过史籍比对与时代背景的考察,可以确定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记载无误,而《纪要》的相关记载存在问题,但这些讹误是如何形成的,仍需分析。

二 《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堡之记载

前文述及,在大同东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迎恩堡、败胡堡的记载方面相异,迎恩堡、败胡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西路管辖,《纪要》对迎恩堡、败胡堡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的记载如下文所示,其可与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图1)进行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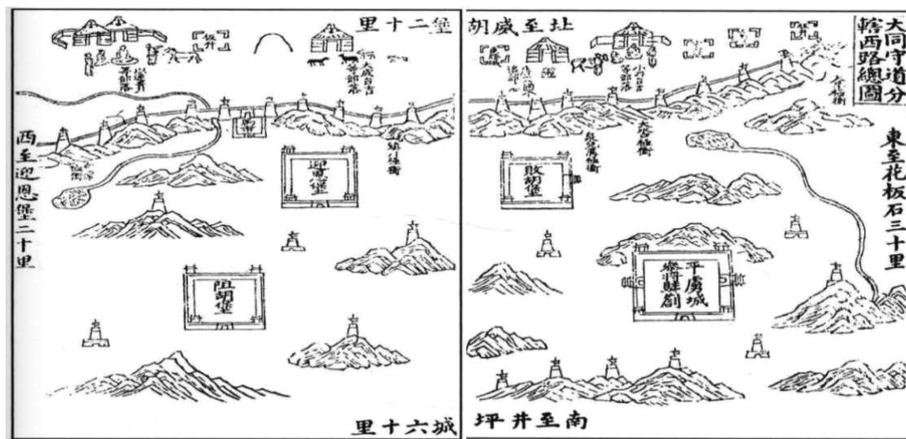


图1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3]420-421}

迎恩堡: 在平虏卫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 万历初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 内镇川墩最冲, 老鹤嘴次之。嘉靖中石州之祸, 此为难治。款塞后设小市场于此, 亦防御要处。

败胡堡: 在平虏卫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 隆庆六年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八里零, 内镇川墩、泉儿沟最冲。嘉靖中寇由此入犯朔州一带, 为冲险之地^{[1]2026}。

通过对比, 可以发现《纪要》所载边堡地理方位与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所示大致相符, 但距离里程、分边沿长的记载相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 “迎恩堡东至平虏城三十里……分边沿长一十里五分。败胡堡东至平虏城三十里……分边沿长八里三分。”^{[3]423-424}

大同中路中, 《纪要》与明代资料在守口堡、靖虏堡、镇门堡、镇口堡、镇宁堡记载方面相异, 守口堡等五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东路管辖。《纪要》对守口堡等五堡在建置沿革、地理方位方面的记载如下所示。

守口堡: 在阳和卫西北十五里。嘉靖二十五年置, 隆庆六年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二里零。堡为阳和之肩背, 隆庆初寇从此入犯, 全镇告急。后徙市于此, 防御要地也。

靖虏堡: 在守口西二十里。嘉靖二十五年置,

隆庆六年增修, 周二里有奇。分边十一里零, 内碾儿沟、子濠沟诸处为最冲。堡一望平川, 隆庆初由沙沟入犯, 戒备不可不预也。

镇门堡: 在守口东一十里。嘉靖二十六年筑, 隆庆六年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零, 内大、小鹤峪极冲。

镇口堡: 在阳和东北六十里。嘉靖二十五年筑, 隆庆六年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零, 内榆林、水磨等口极冲。嘉靖间寇尝由此入犯天成一带, 备御尤切。

镇宁堡: 在阳和东北八十里。嘉靖四十四年置, 隆庆六年增筑,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 内威狐口、白羊口极冲^{[1]2023}。

通过对比, 可以发现《纪要》所载各堡地理方位与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图2)所示大致相符, 但文字记载略有不同。一方面,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在描述镇口堡、镇宁堡地理方位之时, 与《纪要》选择的参照物不同: “镇口堡南至天城三十五里, 西至镇门堡二十里, 北至本堡边墙一里, 东至镇宁堡一十八里。镇宁堡南至天城二十里, 西至镇口堡十八里, 北至本堡边墙一里, 东至瓦窑口堡二十里。”^{[3]398-399} 另一方面,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镇门堡设置时间的记载为嘉靖二十五年^{[3]119}, 而《纪要》为嘉靖二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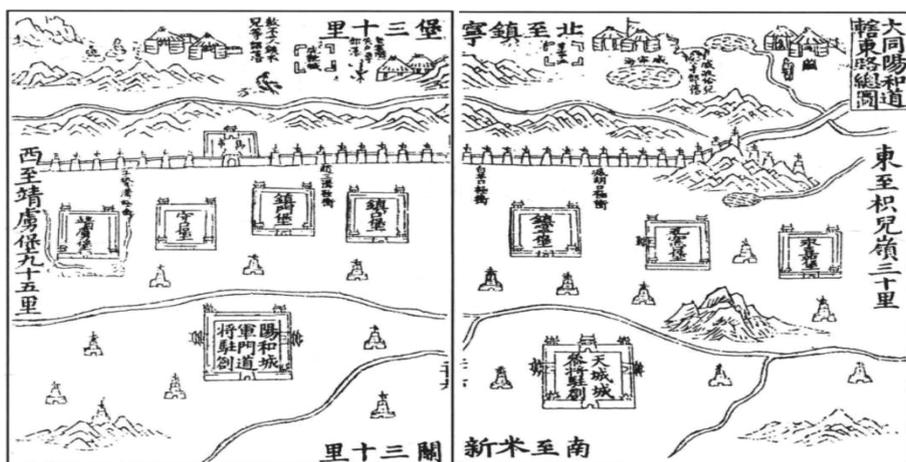


图2 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3]391-392}

大同西路中, 《纪要》与明代资料在马营河堡、破胡堡、残胡堡、杀胡堡、马堡、铁山堡、三屯堡的记载方面相异, 马营河等七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中路管辖。《纪要》对马营河等七堡记载如下所示。

马营河堡: 在右卫西北十余里。万历元年土筑,

周不及一里。分边五里零, 内十水口最冲。

破胡堡: 在右卫东北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 万历二年增修, 周二里有奇。分边四里零, 内平梁、镇静二处极冲。

残胡堡: 在右卫北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 隆庆六年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五里零, 内

东莺、北塔、首阳、林儿极冲, 芹菜坡诸处次之。

杀胡堡: 在右卫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置, 万历三年增修, 周二里。分边二十里零。

马堡: 在残胡堡东。嘉靖二十五年设, 万历初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 内山前沟、二道沟、虎头墩、驼山、双沟子最冲, 而山前墩尤其。

铁山堡: 在左卫西七十里。嘉靖二十八年筑, 万历二年增修, 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 内双墙墩极冲、孔家、半坡、莺黎稍次之。

三屯堡: 在左卫北。隆庆三年土筑, 万历二年增修, 周不及一里。分边亦仅一里零……堡虽临边, 而山险足恃, 左卫之屏障也^{[1] 2027-2028}。

通过对比, 可以发现《纪要》所载各堡方位与

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图3)所示大致相符, 但文字记载存在差异。差异因何而生? 一方面, 两者在论述破胡堡、残胡堡、铁山堡地理方位之时, 选取的参照物不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 “破胡堡南至牛心山堡三十里, 西至马堡一十五里, 北至边墙一里, 东至宁虏堡三十里。残胡堡南至黄土堡六十里, 西至杀胡堡三十里, 北至边墙五里, 东至破胡堡三十里。铁山堡南至云石堡二十里, 西至边墙三十里, 北至右卫城二十里, 东至红土堡二十里。”^{[3]432, 434, 436} 另一方面, 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 铁山堡于嘉靖三十八年修筑^{[3]137}, 杀胡堡于万历二年增修^{[3]135}, 而《纪要》记载分别为嘉靖二十八年、万历三年, 时间上与前者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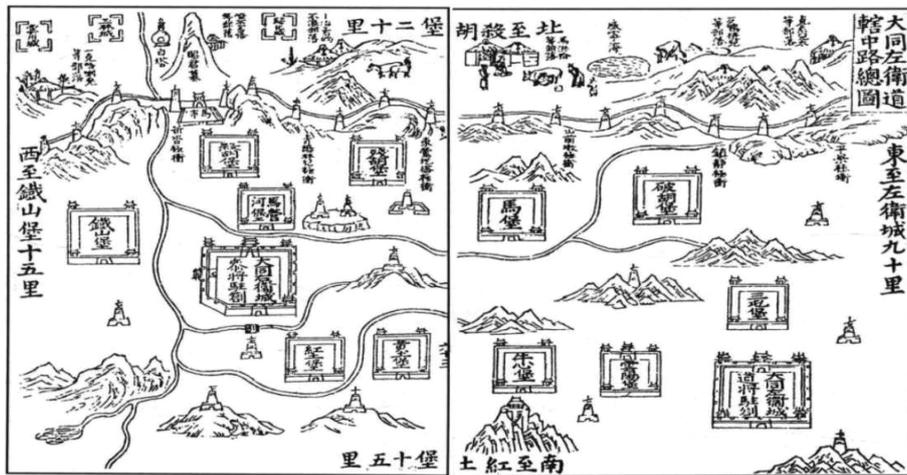


图3 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3]427-428}

综上所述, 《纪要》所载各堡方位及建置沿革, 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明代著作大致相同, 只是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名的记载不同。考虑到《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情况, 顾祖禹对大同地区路、堡记载的错误, 很有可能与清初大同地方建置的地理方位、军政建置变化有关。

三 清初史料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堡之记载

2005年中华书局版《纪要》点校说明记载: “顾祖禹最初撰写《读史方輿纪要》时, 凡叙述明代事实, 均用‘国初’、‘国朝’等字样, 晚年修改书稿时, 又改作‘明初’、‘明朝’。因为卷帙浩繁的缘故, 圈改多有遗漏者……《读史方輿纪要》中还出现四处清初改置州县的文字记载。”^{[1]3}可见, 顾祖禹在撰写《纪要》时, 受时局变动影

响颇深。与此同时, 彭士望所著《读史方輿纪要叙》记载: “祖禹之创是书也, 年二十九……经二十年, 始成是书, 自为历代州域形势通论, 至天文分野, 共百三十卷, 可六千页。”^{[1]3-4}据此, 可以确定《纪要》初稿于顾祖禹49岁时完成, 即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完成。因此, 若要对《纪要》记述内容进行考察, 还需参阅清代史籍。

首先, 就地理方位而言, 清初《(康熙)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都兼述前明情况, 其中附有边堡示意图, 可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的地理位置进行考察。顺治、康熙年间, 大同府仍袭明制, 并无大改动。雍正三年(1725年), 清廷发布谕令, 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 左云卫为左云县, 平鲁卫为平鲁县, 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 俱隶朔平府管辖。改宁武所为宁武县, 神池堡为神池县, 偏关所为偏关县, 五寨堡为五寨县, 俱

但从边堡的地理方位来看,两者大致相符。由此可以确定,在清前期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位置未发生过大变化。实际上,从边堡的性质来看,其多由黄土夯筑而成,难以移动。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变化,这些边堡或增修或裁撤,又或逐渐演变为民堡、聚落。

其次,就建置沿革而言,笔者发现,顾祖禹没有直接记录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在清代的建置沿革情况。然而,在《(康熙)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中,对边堡的文字记载与《纪要》相比,已发生变化。

一方面,《(康熙)山西通志》中所载清代大同镇边堡数量与《纪要》相比有所减少,仅涉及瓦窑口、镇门等15堡^{[5]339-341};另一方面,《(雍正)朔平府志》记载了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堡的裁撤情况。大同中路所辖马营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马堡、牛心堡、云阳堡、三屯堡,在顺治年间已被裁撤。

右玉县境内马营河堡、残虎堡、马堡、红土堡、黄土堡、祁河堡、牛心堡、威平堡、云阳堡,以上九堡,建自明嘉靖、万历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裁撤^{[7]164}。

左云县境内云西堡、云冈堡、灭鲁堡、三屯堡,以上四堡,建自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7]166}。

平鲁县境内灭虎堡,建自明嘉靖年间,内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7]168}。

就大同东路而言,《(雍正)山西通志》《(乾隆)天镇县志》记载了靖鲁堡、镇宁堡、镇口堡、永嘉堡的裁撤情况。

《(雍正)山西通志》:明制靖鲁堡,今隶守口堡汛^[10]。

《(乾隆)天镇县志》:镇宁堡,明设操守一员,兵二百名,今裁并瓦窑口汛……镇口堡,明设操守一员,今裁归并瓦窑口汛……永嘉堡,设操守一员,兵五百名,今裁归并瓦窑口汛……瓦窑口堡,国朝顺治五年,复改操守,裁去坐堡。只存兵九十一名。康熙元年,改为把总。五十七年,改为千总,额设兵一百名^[11]。

与此同时,《(康熙)山西通志》所载原明代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官兵数量,与明代相比已大幅减少。

《(康熙)山西通志》:瓦窑口堡设官兵83名;镇门堡92名;守口堡87名;杀虎堡182名;败虎堡83名;阻虎堡70名;破虎堡70名^{[5]340-341}。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代大同东路所辖守口堡设官兵466名;靖鲁堡461名;镇门堡512名;镇口堡311名;镇宁堡302名;瓦窑口堡468名;永嘉堡298名。大同西路所辖迎恩堡设官兵545名;败虎堡434名;阻虎堡373名。大同中路所辖马营河堡设官兵200名;破虎堡700名;杀虎堡778名;残虎堡395名;马堡364名;铁山堡534名;三屯堡292名;云阳堡313名;牛心堡434名;红土堡275名;黄土堡321名^{[3]118-139}。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1635年,随着漠南蒙古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原明代九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顺治元年(1644年),宣府巡抚李鉴上疏:“上谷一府,在明朝为边镇,在我朝为腹里。前经定制,兵多而员冗,今宜议裁汰。”^{[12]63}宣、大两镇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故李鉴在此处对宣府军事形势的论述,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大同地位的变化,即由“边地”变为“腹里”。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同总兵官姜瓖消灭大顺军后,向清廷投降^{[12]61}。自此,大同等处收归中央直接管辖。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为应对漠北蒙古的动乱,派遣明英亲王阿济格领兵前往大同,引发了“姜瓖之乱”。同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官姜瓖闭门叛”^[13]。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杨振威与裴季中等人合谋,斩杀了姜瓖及其兄姜琳、弟有光,向清廷表示归顺^{[14]365},大同一带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由于大同姜瓖与清军的激烈对峙,大同镇亦遭遇了浩劫。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姜瓖之乱”的爆发,促使清廷对大同驻军进行了调整。同年九月,清廷发布谕令:

丁丑。更定宣、大二镇官兵经制,宣、大总督标兵二千名,分二营……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路参将、中军守备各一员,兵各四百名。右卫、山阴、应州、马邑、高山、聚落、怀仁等城守备各一员,兵各二百名。宏赐、镇川、拒墙、镇边、破虎、灭虎、镇羌、将军会、杀虎、迎恩、破鲁、保安、拒门、威虎、镇门、镇宁、灭鲁、镇鲁、保平、守口、牛心、西安、乃河、云冈、镇口、败虎、阻虎、平远、威鲁、宁鲁、云石等堡,大水、瓦窑二口操守各一员,兵各一百名^{[14]368}。

可见,在顺治初年,清廷已对大同路、堡建置进行调整,不再使用东中西三路总称,而是使用原来的城堡名称代替,转变为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说法。顺治九年(1652年)成书的《云中郡志》中亦记载:“得胜路官兵三百二员名……新平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助马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威远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平鲁路官兵三百二员名……井坪路官兵三百二员名。”^[15]但顾祖禹在《纪要》中,仍沿用大同东路、大同中路等说法,足见他并未受到清初史志记载的影响。

综上所述,山西大同作为明九边之一,在防御漠南蒙古之时,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1635年漠南蒙古收归中央管辖,原明九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虽然在清前期,面对青海、漠西蒙古等部的威胁,大同仍承担了一定的军事防御任务,但其功能已呈现出由军事向非军事功能的演变趋势,杀虎堡等边堡亦由明时的军事堡垒转变为集军事、交通、贸易等多重角色于一体的城镇。然而,若仔细阅读《纪要》,便会发现顾祖禹未对清初大同地区路、堡的新变化进行记载。据此可以确定,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名称及建置沿革的记录截止于明代。

关于《纪要·山西六》对大同路、堡记载的错漏,既然已经排除了客观因素,就应该从主观方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或存在以下两种可能:其一是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一方面,2005年中华书局版《纪要·山西六》校勘记中记载:“附见山西行都司在大同府城内至以上四堡俱威远路管辖,此五千二百三十八字底本全脱,今据职本、敷本、邹本补。”^[12054]在2005年中华书局版《纪要》整理过程中,其以北京图书馆特藏善本“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为底本,顾祖禹原稿本、光绪二十五年新化三味书室邹代过校本、嘉庆十六年龙万育所刊敷文阁本为参校本^[11]。据此,笔者查阅了“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与“顾祖禹原稿本”,发现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对山西行都司至威远路部分的记录,的确存在缺载现象,然而,《读史方輿纪要稿本》对该处记载得十分详尽。虽然顾祖禹在记载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情况之时,为避免受文字狱影响,对部分堡名

进行涂改,如将“靖虏堡”中的“虏”字涂改为“鹵”,将“残胡堡”中的“胡”字涂改为“狐”等^[16]。但总的来说,《读史方輿纪要稿本》的记载与2005年中华书局版《纪要》基本相同,亦存在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名、数量前后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纪要·总叙一》记载:“祖禹贫贱忧戚,杂乱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穷天下之形势;次之不能访求故老,参稽博识,因以尽知天下险易扼塞之处;下之不能备图志,列史乘,不出户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详。惟是守残抱缺,寤叹穷虑,吮笔含毫,消磨岁月,庶几无负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语于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113]此处虽有顾祖禹自谦的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纪要》中记载的许多地方其并未亲自考察,只是通过前人的记录编纂而成。因此,明清更迭的混乱局面,很有可能导致顾祖禹的认识产生偏差。

其二是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从《纪要》成书及流传过程不难发现,该书并无定本。一方面,顾祖禹去世后,因其子孙多贫困,无力刊刻,一时无新本问世,只有部分抄本流传。直至嘉庆十六年龙万育于成都刻印敷文阁本之后,《纪要》才逐渐盛行。顾祖禹稿本则直至民国时期由叶景葵先生购买、校阅,并经钱穆先生鉴定后,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17]。另一方面,结合前文论述亦可发现,《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的记载与明代方志大致相符,只是对各路所辖堡名、数目记载存在前后矛盾。从顾祖禹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记录的方式来看,其一般为先论述各堡地理方位、建置沿革,最后在末尾处总结各路所辖堡情况,但由于一路所辖堡数目过多,往往难以在一页中记载所有内容。故而,笔者认为《读史方輿纪要稿本》、敷文阁本等版本中,对大同路、堡记载的错漏,亦存在后人整理过程中错页、误植的可能。

总的来说,通过明、清方志及《读史方輿纪要稿本》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顾祖禹在撰写《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结合《三

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与《纪要》记载一致的情况,《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

参考文献:

- [1]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施和金,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黄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G]//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
- [4]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G]//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 [5] 穆尔赛.康熙山西通志:卷1[G]//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山西.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6] 清世宗实录:卷32[M].北京:中华书局,1985:495.
- [7] 刘士铭.朔平府志[M].刘裕民,点校.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 [8] 许鸿磐.方輿考证:卷25[M].济宁潘氏华奎阁本,1918—1933:7.
- [9] 许鸿磐.方輿考证:卷24[M].济宁潘氏华奎阁本,1918—1933:29.
- [10] 觉罗石麟.山西通志:卷11[M].清雍正十二年刻本,1734:28.
- [11] 胡元朗.天镇县志:卷2[M].清乾隆四年刻本,1739:5-6.
- [12] 清世祖实录: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 清世祖实录:卷41[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2.
- [14] 清世祖实录:卷46[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胡文焯.云中郡志[M].大同: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269-276.
- [16]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稿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87-1305.
- [17] 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13-514.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51页)

- html?articleid=58960&utm_source=owhat&utm_medium=weido,2020.
- [3] 张 婧.粉丝力量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0-95.
- [4] 闫 宝,畅 榕.“网红”式的偶像与自组织的粉丝:网络赋权下的偶像产业变革[J].东南传播,2016(12):90-92.
- [5] ENKINS H. Fans, Bloggers and Gamers: Exploring Participatory Culture[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22.
- [6] 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M].甘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8.
- [7] ROJEK C. Celebrit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25.
- [8] 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J].当代传播,2017(6):72-76.
- [9] ZHANG W Y. The Internet and New Social Formation in China: Fandom Publics in the Making[M]. Routledge: New York, 2016: 11, 196.
- [10] 信天谨游.王一博肖战的粉丝为村民捐献无羁路!太暖心了[EB/OL].[2021-05-31].https://www.sohu.com/a/469072340_120146124.
- [11] 廖胜华.文化治理分析的政策视角[J].学术研究,2015(5):39-43.
- [12] 郭灵凤.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J].欧洲研究,2007,25(2):65-75.
- [13] 王志弘.文化治理、地域发展与空间政治[M].台北:群学,2011:11.
- [14] 季玉群.文化治理的基础与形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3):141-145.
- [15] PRICE V. Public Opinion[M]. Sage: London, 1992: 57.
- [16] 杨 玲,徐艳蕊.文化治理与社群自治:以网络耽美社群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6(3):66-69.
- [17] 燕道成,刘世博.共享价值观: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伦理精神[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1):43-50.
- [18] 孙 江,何 静,张梦可.智能传播秩序建构:价值取向与伦理主体[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1):41-55.
- [19] 刘俊裕.欧洲文化治理的脉络与网络:一种治理的文化转向与批判[J].Intergrams, 2011, 11(2): 1-16.

责任编辑:黄声波